

【理论探讨】

论当代中国政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

林尚立

【摘要】政治的使命在于创造秩序和推动发展。当代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和成就表明,当代中国政治顺应人类发展历史大势,符合中国实际,超越了资本主义政治,创造了社会主义政治的成功,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当代中国政治,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新境界,既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形态,也破解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长期面临的诸多难题,并提供了新路径、新经验、新空间,是一种新型政治文明形态。

【关键词】中国政治;政治文明;新型政治文明形态

【作者简介】林尚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政治学研究》(京),2024.2.3~12

【基金项目】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人民民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研究”(2023MZD011)的研究成果。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政治与国家相生相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①其内在使命就是把因阶级冲突而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的社会保持在“秩序”范围以内。可以说,国家是人类创造的伟大文明作品,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政治,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件不断发展的巨大的人工制品”^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于1844年在其准备着手研究现代国家起源及其结构特征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提出了“政治文明”^③概念。虽然马克思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对“政治文明”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但他还是为人们更好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形态提供了重要概念,进而开辟了从人类文明演进逻辑把握政治变迁历史规律、从政治文明高度把握不同时代政治形态的新路径。

现代国家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从古代迈入现代而出现的。在马克思看来,不能把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混为一谈,现代国家代表着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其具体形态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马克思认为,作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是更高形态的政治文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人类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的第一次历史性实践,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而第二次历史性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发展表明,俄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实践,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历史实践奠定了重要历史基础;而第一次历史性实践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的终

结,则为中国共产党把第二次历史性实践推向新水平和新高度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相较第一次历史性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历史性实践取得了全面成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从根本上全面完善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拥有了充分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且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凭借第二次历史性实践创造的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发 展奇迹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成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其中包含着作为新型政治文明形态的当代中国政治的伟大实践及其取得的伟大成果。

当代中国政治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依法治国为方略,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着力点,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新中国诞生于1949年,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不到百年。尽管时间不长,在制度上尚未完全成熟定型,但当代中国政治在推动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制度优势,是历史上任何一种资本主义政治所不可比拟的。201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就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一个历史性决议,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向全人类发表的第一份社会主义制度“宣言书”。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宣告了一个历史性事实,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④如果从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历史性的事实,实际上创造了人类发展的新速度、新水平,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⑤。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从这样的历史和事实中,任何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中国政治不仅顺应历史大势,而且符合中国实际;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政治,而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不仅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先进性,而且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政治既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体现,也是当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现,是新型政治文明形态。当代中国政治是鲜活的、具体的,也是开放的、可观察的。人们只要真切地走进当代中国政治,平心静气地了解 and 把握其理论基础、发展道路、制度体系和运行机理,就能充分感受当代中国政治的先进性、合理性和创造性;同时,也能充分感受当代中国政治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价值完整性、结构体系科学性和实践运行的有效性。不论是当代中国政治,还是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根本上是一种开放的政治文明形态。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其发展和实践能够充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其发展和实践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不断健全完善。

作为新型政治文明形态,当代中国政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体现为,在形式上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形态;在内容上有效破解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长期面临的诸多难题,从而给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经验,拓展了新空间,创造了新形态,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古老文明大国实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自我整体转型,创造了五千年文明不断、大一统格局不破的现代国家建构新形态。随着人类历史进程从古代迈入现代,世界各民族都面临告别古代

国家并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历史的大跃进、国家的大转型,在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新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巨大挑战。在当代世界大国中,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实现从古老文明大国整体转型到现代国家的唯有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无疑是绝无仅有的伟大奇迹,既确保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也推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以超大规模的人口和社会整体奔赴现代;既确保了大一统国家结构的现代延续,也推动了最古老的社会确立起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究其根本,就是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孕育了现代中华民族的伟大脊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理论、伟大的革命和强大的领导力为中国开辟了新天地——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践反复证明的历史铁律。

第二,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执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历史性地解决了国家公共权力由大公无私政治力量来运行的千古政治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理论,揭示了一个千古政治难题,即社会因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阶级而产生出来的国家,本应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⑥,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公共权力”^⑦,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⑧,进而把国家异化为维护统治阶级自己特殊利益的工具,成了“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⑨。要破解自国家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千古政治难题,无疑需要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二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并当家作主;三是代表人民执政的政治力量,必须是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力量。历史发展表明,要同时具备这三个前提条件是十分困难的。社会主

义革命可以实现前两个前提条件,但要在革命中和革命后锻造出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力量,则十分困难,不仅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成的强大历史合力,而且需要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力量的理论自觉、行动自觉和组织自觉,进而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内生出自我革命的生存和发展机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党的建设置于首位,以党的建设引领事业发展,以事业发展提升党的建设水平,做到历经千难万苦依然初心不改,铸就百年奋斗奇迹依然坚守使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产物,即把自己锻造成为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而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领导力量。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领导力量,当代中国政治才有了发展出一种新型政治文明形态的政治基础和领导核心。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铸就了由人民作主、服务人民、保障人民的人民民主国家,前所未有地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统一于国家核心功能和使命之中。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以人民为主体、以社会为基础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立足于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发展,把个人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幸福统一起来;同时,立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个体自由和社会平等统一起来,既强调人民的国家必须服务全体人民、保障全体人民利益、确保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都过上幸福生活,也强调人民的国家必须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把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激发出来。所以,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人民居于主体地位,不是国家决定人民,而是人民决定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器都冠以“人民”二字。实践中,国家权力运行始终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为出发点和根本点,其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制

度支撑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谋求全体人民共同发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中,党和国家把一个不落地保障全体人民与保障个体和个体之间权利平等统一起来。正是基于这种统一,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统一于社会主义国家核心功能和使命之中,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国家运行上都全面超越了崇尚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更具合理性、有效性、先进性的民主国家,进而制度性地解决了西方宪政中的一大宪法困境,即宪法作出了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的规定,^⑩而基于宪法运行的国家却难以把切实服务、保障、造福全体人民作为自己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立足点和根本点。

第四,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超越了西方政治制度范式,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新型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各国的政治制度的确立,不外有三种路径:一是革命创制新制度,基于历史演进;二是深思熟虑建构新制度,基于原理运用;三是刻意模仿确立新制度,基于模式套用。在实践中,这三种路径常常同时发挥作用,只是在不同国家最终起主导作用的路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讲是社会主义革命创制的新制度,而其具体创制则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深思熟虑实践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切国家制度都孕育于旧的社会形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则完全相反,是在国家政权摧毁私有制、确立公有制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逻辑上,同以往的历史是决裂的;在理论逻辑上,同西方宪政有本质区别;在实践逻辑上,同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制度精神、制度理论、制度原则、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和制度特性,既体现了

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完全超越了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新型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确立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在实践中,确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完善的联动关系,从而共同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共同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这样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价值上先进、在结构上科学、在功能上高效、在治理上有效,展现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水平、新高度。

第五,党的自我革命和制度自我完善有机统一,开辟了以有效领导的社会革命推进国家发展的新路径,为实现执政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长盛不衰提供了强大历史动力和有效政治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⑪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社会革命,从而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正所谓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然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历史使命的共产党,直接把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和实际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

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
展程度怎样。”共产党人在推进对私有制和剥
削制度的革命时是如此,在领导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公有制社会的实践时也是如此,因
为,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
动的未来”^⑩。领导和推动社会革命,是共
产党人与生俱来的使命,也是共产党人为实
现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唯一路径。所以,在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执
政所形成的实际历史运动,从根本上来讲就
是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
和激发社会活力为目的的社会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中,这种自觉的社会革命行动体现
为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在
其建党百年时向全世界宣告:改革开放是决
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和推动的社会革命,核心就是不
断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活力的激发
提供有效的制度条件和政治保障,这就在客
观上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以自我完善的内
在属性和能力。同时也要看到,虽然自觉的
社会革命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政
治属性和使命担当,但要在千变万化的复
杂实践中始终保有这种政治属性和使命担
当,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在领导和推动社会革
命的同时,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把领导
和推进的社会革命和党自身进行的自我革
命全面联动起来。不仅如此,还必须在此基
础上,形成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的大格局。只有自我革命得彻底,党才有
推动社会革命的强大领导力。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迈
上新高度,推动大党和大国治理不断开辟
新境界,就是创造性地把党的自我革命同党
领导和推动社会革命联动起来,把党的自
我革命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统一起
来,始终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不
论在经济和政治上,还是在社会和文化上,
都获得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和
条件,进而为实

现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长
盛不衰提供强大的历史动力和有效的政治
形态。

第六,大党大国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
组织和治理,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建
设框架和国家治理体系安排,创造了治党
治国一体共强的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
章程》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
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
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
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生活中的运用。”
党的章程同时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
本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
里所说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及其相应
的宪法规定,虽然不是党章规定的“党的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的翻版,但两者
的内在精神和核心原则是一致的,即在党
和国家治理中都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
制这一组织原则,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对
各支部的统一要求而被中国共产党接受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
接受,因为,实践告诉中国共产党,只有实
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
领导中国革命、支撑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
和强大政党。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因此
而走向成功,不仅建立了强大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而且建立了强大的人民军队,进而
赢得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中国共产党的上百年奋斗历程中,建党、建
军、建国依次展开,而贯穿其中的核心原
则都是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没有民主集
中制,就不可能有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
民军队和人民民主国家,也就没有当代中
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

现代政治逻辑表明,民主是现代政治的
内在要求,集中是现代国家的本质属性。没
有民主,现代政治就丧失了合法性前提;没
有集中,现代主权

国家难以确保应有的一体化结构。现代政治是在反对和否定集权专制政治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实践中往往以民主为第一信条,以自由为第一原则。这使得许多国家,甚至包括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常常把民主绝对化、神圣化,以至于忽略了现代市场经济对国家一体化的强烈要求和内在依赖,结果,民主搞得热热闹闹,可国家的内在一体和有效集中却一地鸡毛,支离破碎,整个国家陷入低质、无序的“民主之乱”中。此外,美国政治学家达尔认为,建构现代政治和国家,还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的规模问题,他说:“规模问题确实很重要。一个政治单位,无论是它的人数或者面积,对民主的形式都会造成影响。”^⑧在当今世界,如果把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综合起来算,中国无疑是超大规模的国家。正是贯通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很好地把社会对民主的要求和国家对一体化的需求有机地统一起来,确保了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以及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国家始终处在组织有力、运行有序、治理有效的状态。在党内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领导体系;在国家结构上形成了以单一制维系持续了几千年的大一统格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国家治理体系上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体系。党的有效领导,确保了国家有效组织和治理;反过来,国家的有效组织和治理,巩固和增强了党的有效领导。大党大国的组织和治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中实现的,而创造治党治国一体共强格局的基点和支撑就是民主集中制。

第七,人民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形成的强共识性政治生活,铸就了超大规模国家社会长期稳定局面,创造了以共识而非竞争为基础和动力的国家政治生活形态。社会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有形的组织”^⑨的国家则是政治共同体。不论维系社会还是维系国家,除了规范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制度之外,就是作为社会或国

家主体的人对社会和国家所拥有的共识。西方学者研究认为,“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民主制度若不能成功地逐渐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它是一个难以运转和脆弱的民主制度”。^⑩这其中的道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目了然的,但西式民主真要做到并非易事。这一方面与社会历史文化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引入政治生活有更直接的关系。在自由主义民主下,人们最大的共识是对自由竞争的共识,而人们最大的担忧则是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和国家动荡。这其中的内在矛盾已成为自由主义民主的宿命,许多国家因此常常面临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和治理失效。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其制度安排的出发点不是个人自由,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由此形成的整个政治生活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从制度上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领导确保了人民整体性,人民当家作主确保了国家的人民性,人民由此形成的对党和国家的共识,除了有中华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之外,还有就是强有力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和利益认同。强共识性政治生活就是由此得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体现有:党成为民族的脊梁,党的领导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宪法成为组织、运行和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和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全社会的精神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全党和全体人民最基本的思想武装和思维方法;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以及在各项重大决策出台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共建共治共享成为社会治理制度的原则和形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党的使命和国家发展目标。实践表明,这样的强共识性政治生活在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同时,也持续不断地激发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同时达成并形成长期良性联动关系的事实是最有力的印证。基于强共识所形成的中国之治和中国发展,从理论、制度和发展实践上都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选择,即以共识为基点凝聚社会力量、激发国家活力、创造历史进步。

第八,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方位激发了民主所具有的内在优势,使人民民主成为能同时成就个人、造福社会、治理国家、促进发展的善治民主。民主是人类组织社会、建构国家、达成治理的内在律令,从古至今始终是影响或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理想建构、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的文明基因,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创造了繁花似锦的民主发展景观。人们对民主的追求是由衷的,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实中的民主同人们理想的民主总是存在不小的距离。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确保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从理论、制度、组织、方法等多维度探究和实践民主,但更多注重于民主之用,没有根本解决民主之体问题,即人民在社会和国家中主体地位的切实保障和实现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及其所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运动的出现,才使得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真正落实到民主之体上。我国的人民民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理论和实践表明,人民民主的历史和社会前提人民解放,而其根本就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⑥,即建立以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⑦、进而建立劳动人民管理的国家。换句话说,人民民主是确立在劳动人民获得经济解放、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基础上,经济解放的制度基础

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解放的制度基础就是国家不是掌握在社会少部分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国家重新回归到社会之中,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⑧。政治解放的制度基础就是作为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的制度被彻底消除,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并获得全面发展的政治保障。解放的人民是人民民主的真实主体,人民通过自己的力量管理社会和国家是人民民主的制度形态,由此形成和发展的人民民主不仅是最广泛的,而且也是最直接、最真实、最管用的。

在实践和运行中,这种最直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人民民主必然是全过程的、全方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⑨我国人民民主的实践表明,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党的领导全过程,而且体现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全过程;不仅体现在立法的全过程,而且体现在行政的全过程;不仅体现在党的群众工作全过程,而且体现在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全过程,形成了人民意志、人民权益、人民参与全面性保障,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联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方位发挥的真实有效高质量民主。因此,在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是人民始终参与其中、不断凝聚人民意志力量、全面为人民利益服务、持续促进人民事业发展的有效

政治形式和政治过程,其运作和实践所具有的效能自然是全方位的、全局性的,不仅能够成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能够造福社会方方面面;不仅能全面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而且也能凝聚人民力量创造发展奇迹。人民民主的实践表明,民主的决定力量是人民,民主的使命是造福人民。因而,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其好与坏的最终标准,就看其是否对人民发展有益、对社会进步有用、对国家治理有效。

第九,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有效解决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一个重大制度难题,从制度上促进和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巩固和成熟。公共权力是国家的核心要素,是政权的基础,是政体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从古至今,中外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充分意识到引发国家动荡、政权更迭和政体变异的诸多原因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权力运行失序、权力结构失衡、权力本质腐化。人性的弱点使得靠人运行的权力很容易发生变异,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③。于是,制约和监督权力及其运行就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史的永恒主题和头号难题。在解决这个头号难题中,资产阶级思想家立足保障个人自由这个基点,提出以权力制衡权力的理论和制度设计。马克思主义立足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当家作主这个基点,提出了人民依靠自己力量监督其所掌握国家权力的理论和制度原则。然而,实践表明,把这个理论和原则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一直质疑不搞“三权分立”的国家实现权力自我监督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从理论、制度和实践的三个维度有力回应了这种质疑,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自我监督的理论和原则切切实实地转化为有效实践体系和规范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历史性制度创造,与新时代在理论上、制度上和政治上三大历史性突破有关:一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夯实了在中国社会构建权力自我监督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历史文化基础;二是在制度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大力强化民主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和效度;三是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立并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正是在这三大历史性突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全面确立起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201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该监督体系的制度安排及其发展方向作了具体阐述,强调“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④这个体系的具体制度安排包含三大方面:一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二是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三是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确立和发展,既有力巩固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党的领导,也有效控制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风险的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巩固和成熟提供更为坚强的政治保障和更为有效的制度保障。

第十,“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成功实践,既给人类社会解决矛盾和冲突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有效路径,也给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政治非凡的品质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完成国家统一上面临两大问题:一是香港问题;二是台湾问题。前者涉及香港回归,后者涉及祖国统一。面对这两个问题,邓小平认为:“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②基于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随后将这个方针成功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实现香港顺利回归。“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及其成功实践,既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也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同凡响的特色所在。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③可见,“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既是中国特色使然,也是中国特色体现。这种中国特色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所具有的非同凡响的品质和特性,展现了社会主义大国政治的新追求、新境界和新气象。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和成功实践,系统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非凡的品质和特性。一是和平性。中华民族坚信和为贵,中国人主张和平,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二是科学性。正如邓小平所言,“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④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行动原则赋予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科学性。三是创造性。中国政治的创新性来自实事求是精神所带来的敢于突破传统、摆脱窠臼、开拓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创新底气。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⑤在这方面,“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⑥四是包容性。社会主义制度包容资本主义制度才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其政治逻辑是:在坚持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说:“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⑦实践证明了这一观点。五是发展性。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始终坚信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历史潮流总是奔腾向前的,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以长远的眼光来把握发展。对于“一国两制”的实践及其前景,邓小平作出了这样长远的安排:“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⑧上述这五大品质和特性,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先进性和优越性,使其成为能够引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为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经验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态。

综合上述概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政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是历史性和制度性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为当代中国政治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切切实实地推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人类社会发展新时代。制度性贡献,体现为当代中国

政治为被恩格斯视为“国家的最高形式”的“民主共和国”创立了一套全新的制度体系,即一套比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制度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和国家治理实践表明,这种历史性和制度性的贡献,不是理论上讲的,而是可以实际检验,可以具体测度,可以借鉴学习的。同时,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历史性和制度性的贡献是在对人类政治文明继承和发展、开拓与创新的实践中形成的。因为,当代中国政治从一开始就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追寻人类政治文明最先进的发展方向,创造性地吸纳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发展历程表明,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不仅有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有中华五千年文明成就,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探索和实践,而且有人类政治文明创造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了其伟大和正确,中国人民展现了其自主和自信。

事物总是发展的。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尽管是新型的、先进的、有效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成熟的、完美的,更不能说是至高无上的。从人类发展的大潮流、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建设还有不少的心愿要追寻,还有不少的高山要跨越,还有不少的目标要实现,还有不少的体制机制要改革。历史与实践表明,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理想、以推动社会革命为使命的当代中国政治,志存高远、与时俱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信发展永无止境,坚持在发展中完善,既不会固步自封,也不会自我神化,必然会在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革命中主动且积极地进行自我变革、自我创新、自我发展,不断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开拓新境界,提供新

路径,创造新制度,从而持续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新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6、1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8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⑤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9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1页,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第116页。

⑩亨利·范·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第124-125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306页。

⑬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11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1页。

⑮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94-95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⑯⑰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第644页,第95页。

⑲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⑳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阿克顿勋爵论文集》,第34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㉑《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95页。

㉒㉓㉔㉕㉖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页,第217、218页,第101页,第102页,第217页,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